

新四軍和蘇南抗日根據地鬥爭記事

歐陽惠林

· 江蘇省革命鬥爭史編纂委員會

目 录

- 几点说明……………(1)
- 一、苏南在新四军战略任务中的地位……………(3)
- 二、新四军东进序曲——向苏南敌后进军……………(4)
- 三、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斗争的开展……………(17)
- (一) 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
- (二) 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 (三) 苏皖区党委和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苏南敌后斗争的发展
- 四、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敌顽夹击、艰难困苦中巩固发展…(38)
- (一) 新四军主力北渡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情况
- (二) 皖南事变前后的苏南敌后斗争
- (三) 东路反“清乡”斗争和恢复茅山、江句地区情况
- (四) 一九四二年的苏南敌后斗争和五月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
- (五) 一九四二年七月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和八月苏南民运工作会议与秋收减租运动
- (六) 一师二旅南下和苏南县长联席会议
- (七) 茅山地区反“清乡”斗争
- (八) 两溧地区的反顽战斗
- 五、新的大发展，向南进军，扩大解放区，坚持苏南敌后抗战到最后胜利……………(109)
- (一) 一九四三年冬，敌、顽、我斗争形势
- (二) 苏皖区党委在胥井召开扩大会议，苏南敌后斗争新发展
- (三) 一师南下，苏浙军区成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六、结束语..... (131)

附：

一、注释

二、一九三八年夏进入苏南敌后时的新四军各支队、团首长姓名表

三、各种统计表

四、本文参考的主要文献资料篇目

新四軍和苏南抗日根据地

斗争紀事

几点说明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我随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由皖南撤出到苏南，被留在苏皖区党委机关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现就我所了解的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广大军民在苏南敌后斗争中的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史实作一简要记述，题为《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斗争纪事》，供研究、编写江苏革命斗争史的参考。这里，有几点说明：

一、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写了一篇关于苏南敌后抗日斗争情况的报导稿，原拟在苏南新四军北撤后公开发表，目的在于宣传苏南新四军的光辉战绩和苏南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对苏南新四军的造谣诬蔑。后因蒋介石挑起内战，自卫战争爆发，这篇报导稿就未寄出。全国解放后，这篇报导稿曾以笔名“杨林”、题为《苏南敌后抗日斗争简史》刊载于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八期上。当时，我写的报导稿，因着眼于公开发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宣传斗争，故只着重于军事斗争方面的叙述，对建党、建政等方面情况均有意从略。一九五九年，在号召写革命斗争史期间，我曾把建党、建政等方面情况略加增补。现在又在一九五九年修订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篇幅的补充，对于某些重大史实，还找了一些文献资料并与有关同志

进行了核对，务求翔实，减少差错。

二、本文所叙述的史实的依据：皖南事变后的情况，一般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还保留有抄存的当年苏皖区党委发的一部分指示文件和部分特委、县委的工作报告及其他文献资料，可以查考核对。至于皖南事变前的情况，主要是我过去在担任苏皖区党委秘书长时，在工作中，通过间接关系收集和了解到的。

三、本文所称的苏南，主要是指当时的京沪铁路（即今沪宁铁路，下同）以南、京（宁）芜（湖）铁路以东、苏（州）嘉（兴）铁路（这条铁路被日寇拆除）以西的江苏南部地区，并包括皖南的广德、郎溪全县和当涂、芜湖、宣城三县各一部分，以及浙西部分地区。至于京沪铁路以北、苏嘉铁路和锡澄公路以东，直至上海近郊各县的长江以南地区，即一般所称的东路地区，当时不属于苏皖区党委领导范围。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汪宣布在东路地区“清乡”后，东路地区又划归苏中区党委管辖。丹北地区原属苏皖区党委领导，在东路地区“清乡”，六师师部转移到苏中后，也划归苏中区党委管辖。当时，我一直在京沪铁路以南地区行动，对东路地区和丹北地区的斗争情况不甚了解，故文中很少述及。

四、由于作者认识水平有限，史料收集不够全面，抄存的资料又在“十年内乱”中损失了一部分，加以时间太久，年老记忆衰退，叙述遗漏和谬误之处，一定很多，请当年参加苏南抗日斗争熟悉情况的同志，予以匡正、补充。在这里，我只是就我所知，提供一点资料、情况和线索。

一、苏南在新四军战略任务中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平津后，又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中央及时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

一九三七年冬，淞沪战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溃败，苏南广大地区沦陷。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注1）成立后，党中央就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任务是：“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当时，大江以南沦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都是军事要地，日寇驻有重兵，它既是日寇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战略后方，又是屏障华北，实行南进，灭亡全中国的枢纽地带。苏南地区紧靠上海、南京，而上海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日寇实行经济掠夺的中心；南京又是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苏南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敌人控制了这个地区，不仅成为侵华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而且可以掠夺这里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我们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就无异象一把利刃插入敌人的心脏，狠狠地打击敌人，钳制其西进南攻。我们还可以使用这里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壮大人民抗日力量，支持全国抗战。屏障正面战场，配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由于苏南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它是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和我党三方必争之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 and

河湖港汊地。在山地根据地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建立茅山根据地的问题，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保证”。同时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的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当年新四军四个支队，就有三个支队在大江以南，所以，江南是新四军的主力所在，也是新四军的主要基地。新四军军部就设在皖南，但皖南地区紧靠国民党的后方第三战区，只有沿江南侧一条狭窄地带被日寇占领，是沦陷区；而苏南地区全部被日寇占领，成为广大的沦陷区，有广阔的活动余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苏南地区，当时是新四军向大江以南敌后进军的主要方向。

二、新四军东进序曲——向苏南敌后进军

新四军的东进序曲，是在苏南。这是陈毅同志对当年历史的正确评述。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从第一、二、三支队各团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同志率领下，由皖南歙县潜口出发，越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实施战略侦察。在先遣支队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及时致电项英同志：“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注2）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

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个指示为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的活动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随后，第一支队在陈毅同志率领下，第二支队在张鼎丞同志率领下分别于同年六月和七月进入苏南。当时部队作战配置的情况是：第一支队越宣（城）芜（湖）公路之间封锁线，经宣城县水阳进入高淳县境，司令部于六月十日到达溧阳竹箠桥地区，十三日晚再越天王寺、金坛之间的溧（水）武（进）公路进入茅山地区，开始在句容二区行动，曾一度进驻宝坨镇上，后因敌人占领宝坨镇，又移到农村。其所属一团当时的作战地区配置在溧水、江宁、当涂三县境内，其活动直抵南京近郊，同年十月，奉命调回皖南新四军军部。二团当时的作战地区配置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境内，即一般所通称的茅山地区为其活动中心。在卫岗战斗后，先遣支队奉令结束，粟裕同志回到第二支队。当时第二支队司令部率三团和四团一部已进入苏皖边大官圩地区，司令部开始设在当涂县塘南阁，后南移到宣（城）高（淳）边境的狸头桥附近。其所属三团当时的作战地区配置在石臼湖西的当涂、芜湖两县境内，主要是在小丹阳、大官圩地区活动，由南向北发展。同年十月，一团被调回皖南军部，三团接替一团防务进入横山地区（注3）活动。一九三九年春，三团又奉命被调回皖南新四军军部。四团一个营先随第二支队司令部行动到达苏南后，四团团部及所属部队全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到达塘南阁与第二支队司令部会合，当时的作战地区配置在宣城、当涂、芜湖三县境内，同年十月初，奉调进入石臼湖东的溧水、高淳地区（注4），接替一团防务，在新桥地区活动，东到溧阳竹箠桥地区，同时由南向北发展，十一月间越天王寺、溧水之间的溧武公路进入江（宁）、溧（水）、句（容）边境，开辟了郭庄庙周围的地方工作，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到赤山、

土桥、龙都周围，直到句（容）北山区。第三支队所属的六团在叶飞同志率领下，则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进入苏南，先在水阳地区，后来，东移到茅山地区活动，归第一支队指挥。

在新四军东进之前，苏南已沦陷半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在短短一个月中京、沪、杭、芜之间的广大地区，城市、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集镇都被日寇占领，安下据点。日寇采取极其野蛮残酷的帝国主义杀戮政策，南京大屠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大暴行之一。日本侵略军凭藉据点，下乡骚扰，抢劫掠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田园荒芜，庐舍为墟。汉奸则应劫而生，一些民族败类、社会残渣、封建余孽出面组织伪军伪维持会，如任援道组织伪绥靖队，常玉清组织伪安清同盟会，梁鸿志、江亢虎组织伪维新政府，等等，进行猖狂活动，残害人民，为虎作伥。日寇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占领徐州、蚌埠，打通津浦铁路线后，又大举西犯，攻掠武汉，侵略战线继续扩大，而日寇兵力基本上不足。当时留驻在常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日军不过三个联队，故在苏南军事上不得不采取守势，主要是巩固其已占领的城镇和交通要道，积极扶植汉奸势力，散布“和平”，挑拨民族团结，焚毁抗日民族意识的教科书，实行奴化宣传教育，企图消灭中国人民抗日的民族意志，积极筹征各种税捐和田赋，掠夺沦陷区内中国人民的血汗，以战养战，妄想尽快结束战争，灭亡全中国。这时，国民党于南京、上海大溃败之后，惊惶未定，大批官吏，靦颜投敌，或者弃职逃跑，党政组织瘫痪，一时未能恢复，广大苏南敌后农村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地盗匪蜂起，散兵游勇，流落四乡骚扰，人民不能安居，普遍要求组织武装，保家自卫。当时，抗日游击队的名目很多，大体上可分以下六类：（1）国民党军队溃散

的官兵自己纠合组织起来的，其头目大都是中、下级军官；（2）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主要是当地国民党的党棍搞起来的，大部分是以原国民党县、区政府留下的常备队为基础；（3）青红帮、道会门头子拉起来的“游击队”，以其徒子徒孙为基础；（4）封建士绅集议组织起来的保家自卫的武装；（5）抗日进步青年、进步教师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起来的武装；（6）失去党的关系的同志和后来由上海党派人下乡参加领导的武装。这些抗日游击队，除了最后两类是抗日救国、保境安民的武装以外，其余前四类大都是利用群众抗日情绪，凭着自己的社会基础，招兵买马，收集散兵游勇、帮会徒弟甚至盗匪组成，成份相当复杂。他们打起“抗日游击队”的旗号，自立名义，自封司令，一时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到处设卡收税，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更有甚者则打家劫舍，与盗匪无异。他们假借抗日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人民仍然吃尽苦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新四军一到苏南，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拔除据点，镇压汉奸，剿灭土匪武装，为民除害，使农村秩序逐渐走向安定，受到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忱拥戴。许多失去关系的老党员、进步青年、进步教师、爱国人士以及一些开明士绅组织起来的武装，纷纷来找新四军接头，要求派人帮助整训部队，学习游击战术，接受新四军的领导。

从一九三八年六月，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到同年年底，这是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时期。在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之前，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

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苏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三个基本条件去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的东进，为开辟和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准备了第一个条件，但是我们还要善于使用这支武装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群众。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凌晨，先遣支队在镇（江）句（容）公路上的卫岗伏击日寇运输车队，刀斩敌酋土井少佐、梅岗大尉，毙伤日寇三十余人，击毁敌汽车五辆，缴获枪枝弹药及满载车中的军需品，取得卫岗战斗的首战大胜。接着七月一日夜袭新丰车站，八月三日袭击永安桥，八月十三日攻入句容城，八月二十日进行珥陵伏击战，以及麒麟门战斗、竹子岗战斗、新塘战斗、江宁镇战斗、禄口战斗，等等，发扬我军游击战争的经验 and 特点，根据不同情况，地形条件与敌我力量对比，灵活地运用伏击、袭击、夜袭、奇袭各种手段和方法，广泛地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炸桥梁，破铁路，毁车辆，收电线，烧敌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消耗敌人，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从六月到八月，新四军主动出击，积极进攻敌人，全区大小战斗一百余次，集小胜为大胜，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苏南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我党我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日寇占领上海、南京，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败之后，骄气十足，认为大局已定，很多据点的警戒比较松懈，我们易于攻击取得胜利。自从新四军到后，给它以不断的打击，据点时受攻袭，汉奸常被镇压，日寇开始感到新四军对它的威胁，除了增筑据点工事，加强守备，封锁交通以外，还从上海、杭州等地调来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间的防务，图保京沪铁路及其他交通要道

的安全。同时，把宣（城）长（兴）公路一线的日军后撤，集结到溧武公路以北地区，开始对新四军进行反扑。“扫荡”，采取疯狂地无人性地烧杀报复行为，造成恐怖现象，妄图动摇人心，挑拨军民关系，使群众不敢援助我们，阻止新四军的活动和发展，进而达到消灭或者逼走我军退出京镇地区。但是，由于当时敌人进攻武汉，兵力基本上不足，不可能在苏南整个地区同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也不可能进行长期持久的“扫荡”，它只能在局部地区进行短时间的突击性的有重点的反扑、“扫荡”。这就有利于我部队转移穿插，避实击虚，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其“扫荡”。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敌人兵力的不足，故只能集中于以下的东西两个中心：在西边，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京芜日军集中四千余人，以小丹阳地区为中心进行“扫荡”，我军跳出其“扫荡”圈，采取分散游击扰敌，奋战五天，我第二支队部队将敌之八路“扫荡”粉碎；在东边，同年九月十日，镇江周围日军集中三千余人，以宝埝地区为中心进行“扫荡”，重新占领宝埝镇，同时，在珥陵安下据点，分割我军活动，我军转移到外线作战，打击敌人，我第一支队部队将敌之六路“扫荡”粉碎；同年十一月一日，日军又分三路再次“扫荡”延陵地区，也被我军粉碎。从九月到十二月，我军共粉碎日寇大小“扫荡”三十二次。在我军刚进入苏皖边界时，即遭到盘踞在小丹阳地区自封为游击司令，与日寇勾结，残害群众，由国民党溃散军官朱永祥组成的土匪武装一千余人的袭击，我军为解除抗敌的腹背之忧，八月上旬，一团奉令在梅村将该土匪部队全部解决。随后，我三团又在当（涂）、芜（湖）大官圩地区逼走挂着国民党苏皖游击纵队招牌的反共武装余宗巨部。我军经过这样反复多次的大小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反扑、“扫荡”，消灭一部分汉

奸武装，解决了勾结日寇的土匪部队，战胜了敌人，解放了部分乡村，安定了人心，逐步把日寇占领控制的地区变成为我们控制的地区，并逐步地走向稳定的游击基地。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我们在句容二区，镇(江)丹(阳)金(坛)边境的延陵地区，江(宁)溧(水)句(容)边境的郭庄庙地区，溧水的新桥地区，江(宁)当(涂)溧(水)边境的小丹阳地区和当(涂)蕲(湖)边境的大官圩一带，先后建立起星星点点、一小块一小块的游击基地，拥有人口四十万人，为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时，我主力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地方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苏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苏南是我党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我党在这个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宜兴、无锡、江阴等地都曾经多次举行过农民起义。“九·一八”事变后，在党领导下的反日救亡运动曾经在苏南各地不断兴起。因此，在苏南敌后，各地失去党组织关系的一些同志和一些进步青年、进步教师、爱国人士，纷纷起来组织抗日武装。这时，这些抗日武装队伍也都来找新四军接上关系，或者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被我们争取过来，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合作抗战。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部队，经过整顿改造，加强政治教育，尔后逐步发展成为新四军的主力；这些抗日武装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人，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他们对开辟和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以及尔后向北、向东、向南的发展，都各自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我军的困难是敌强我弱，人员不充实，武器装备差，缺乏对日作战的经验，我军素以山地游击战见长，而对江南地形多是平原、河网、丘陵的复杂情况不熟悉。这些，都是我军面临的困难和弱点。但是，敌人是异民族，野蛮残暴，与中国

人民为敌，只要我们紧密地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就能够克服人员不充实，武器装备差，地形不熟悉和缺乏对日作战经验的这些困难和弱点，发挥人民战争的长处，使日寇陷入火牛阵中而被困死烧死。党中央在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就曾强调深入到敌人后方去，要“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新四军继承红军时代的革命优良传统：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由各支队、各团政治机关派出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组），或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随军行动，到地方上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初到时，群众对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这一点，还不十分了解，对国民党大军溃败时的坏印象很深，看到新四军武器装备太差，怕不能打胜仗，蹲不长，标语贴到他们墙上，人住在他们家里，将来新四军走了，鬼子汉奸来报复，杀人放火烧房子吃不消，存在着种种思想顾虑。有些上层人士，过去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不了解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也不愿接近我们。所以，我们的群众工作，首先是通过个别访问，召开座谈会、群众会、军民联欢会，等等，着重进行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战争政策的宣传教育。当时宣传内容，主要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文件精神，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弱点和长处，指出中国不会亡，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但中国又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战胜利信心，克服恐日病和悲观思想。同时，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一切抗日阶层，争取广大的上层人士与我们合作抗日，孤立敌人。另一方面，我

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多用口头宣传，少在墙上贴标语；多流动宿营，不久住在一个村庄，有时群众不愿部队住在他家中，我们就露营；并用自己的模范纪律与战斗行动去争取胜利，多打胜仗，保卫群众的生命财产，从而逐步改变了群众的旧观点，消除了种种思想顾虑，争取得群众帮助我们。我们发动群众工作，是以提高人民的抗战觉悟，进行武装游击战争为中心的。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培养和吸收一批当地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抗战活动，举办青年训练班，然后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各种抗日救国会，成立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或抗战动员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常备队、自卫队或游击小组，站岗放哨，侦察带路，救护伤员，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汉奸卖国贼，巩固地方治安。当时，沦陷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我们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到改善人民生活问题，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在秋收后，提出了二五减租的主张，这是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有明文规定的，由于富有的地主大部分逃亡大后方，敌占城市中的地主不敢下乡收租，故在这一方面的阻力不大，但在农村中的地主，采取各种方式对抗，明减暗不减。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我们在一些地方发展了党员，建立起农村支部。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部队活动范围的扩大，我们派出了大批专职的党群工作干部留在各地，建立起地方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一支队进入茅山地区，首先派出邱东平等人随军开展群众工作，七月又派出吴仲超作地方工作，以丹阳二区为中心，发动群众，成立各乡的各种抗日救国会，发展了党员，在庄湖头建立了农村支部。成立了中共苏南区工委，吴仲超为书记。同月，陈毅同志亲自领导召开了镇江、句容、

丹阳、金坛地区各界代表会，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后加入共产党）和第一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王丰庆为副主任。负责领导抗战动员工作。不久，纪振纲迁居上海，由樊玉琳接任主任。同年九月，中共苏南区工委改为苏南特委，以吴仲超、王丰庆和二团政治副主任郭猛（注5）三人组成，吴仲超任书记。丹阳二区是茅山地区通往丹北、江北的要道，苏南特委成立后，将丹阳二区两镇八乡分散的自卫队整编合并成立延陵常备队，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同时，派郭猛到丹（阳）北地区开辟工作。这时一支队还派了一批干部到管文蔚部队帮助进行整顿训练，将丹阳游击纵队改为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郭猛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为参谋长。二团一部亦于此时在王必成率领下越京沪铁路进入丹北地区，向澄西方向发展，进行战略侦察，与当地游击队梅光迪部取得了联系。梅光迪部是在日寇占领后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有上海党派出何克希等同志到梅光迪部进行争取工作，获得成功，梅光迪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参加抗战。该部在与二团取得联系后，开到京沪铁路以南地区，由第一支队派人帮助它进行整训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负责政治领导。

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二支队进入苏皖区边境后，政治部派出干部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开始，小丹阳的工作组由钟得胜负责，博望、洪蓝埠的工作组由杨辛负责。同年八月，在大官圩地区成立了当涂县四区抗战动员委员会，丁绩咸为主任，邵时安为副主任，第二支队派出张开荆等同志参加该地抗战动员委员会工作。不久，张开荆回到第二支队司令部，第二支队政治部另派彭冲等同志到大官圩地区工作，发展了当地知识青年朱昌

鲁、李茂恕(注6)等人入党，成立当(涂)尧(湖)县工委，彭冲为书记，在庄城湾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农村支部。同年十月，第二支队司令部移驻宣(城)高(淳)边境狸头桥地区，在水阳成立了宣城县水阳抗战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宣城县党部书记长张云逸(一说叫张云门)为主任，张鼎丞同志为副主任(后由陈立平接任)。高淳地区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曾由第一支队政治部派戈白章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去开辟，在县城成立新四军高淳办事处，戈白章任主任，开展城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淳溪镇支部，并向四乡发展。同年十一月，第二支队政治部调彭冲接替戈白章，成立了高淳县工委。抗战动员委员会这个名称，当时是沿袭国民党区域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形式，便于同当地国民党进行合作，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活动。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团进入苏南，担负江当溧和溧(水)高(淳)两地区游击战的任务，曾经派出民运工作组开辟这两地区的群众工作，在溧水县新桥地区开办了青年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当地知识青年，吸收了张一平、曹明亮等人入党，相继在沙岗、李巷、大树下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农村支部。随后又在高淳境内吸收了李代胜等人入党，相继在漆桥、港南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农村支部。同年十月初，四团奉命进入溧(水)高(淳)地区，接替一团的防务，另派出邱湘田等人开展地方工作，成立溧高县工委，曹明亮为书记。同年十一月，四团一部进入江(宁)溧(水)句(容)地区，首先在郭庄庙周围活动，由部队在山头边、端庄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农村支部。一九三九年春又派出姜杰等人开展地方工作，相继成立各乡的各种群众抗日救国会和成立江溧句游击队。